



为政以德：中华民族国家治理的价值导向

□ 陈 良



中华民族是崇尚道德的民族，上古时期就形成德治思想与尚德文化。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尚书·尧典》即开宗明义指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春秋时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明确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不仅强调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所有的星辰都围绕着它运行；而且强调为政者的道德引领作用，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一书里，详细记述了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兴衰成败，也评价了历代君臣的道德状况。有些政治家则根据自身从政经验，提出有关为政的道德价值观，如北宋政治家范仲淹在推行新政受挫被贬之后，在《岳阳楼记》中深有感触地写道，为政者应当“宠辱不惊”，心系天下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族英雄岳飞则认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为政以德”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为政者提出诸多道德要求或原则，概括起来，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忠诚，在中国古代体现为忠君道德。孔子指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则主张君臣对应关系，反对臣对君的绝对义务，“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

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但是，统治者则要求臣子绝对忠诚；明君唐太宗强调，“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君主时代已然终结，现在讲忠诚，应当体现在忠诚于国家与人民。

爱民。孔子主张仁政，指出为政之道必须“因民所利而利之”，“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爱民，关键要尊重民众。《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则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古代地方长官多以“民之父母”自居，官尊民卑。事实上，人民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只有思想上重民，才会在感情上爱民。清代郑板桥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正因为他爱民忧民，方能写出“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句。

公正。在家天下时代，《吕氏春秋》就提出“天下为公”的思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有成功治国理政经验的唐太宗认为，“为政莫若至公。”古希

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原则是政治学上的最高原则，“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吕氏春秋》说，要做到公正，必须“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春秋晋国大夫祁黄羊举贤不避亲仇，就是公正无私的体现。唯有去私为公，才能正确对待权力，而不以权谋私，才能正确对待他人，做到任人唯贤，才能正确对待功名，而不沾名钓誉。

清廉。清廉自守，既是从政原则，也是道德标准。《尚书·皋陶谟》记载了皋陶提出的公职人员应遵守的“九德”，其中就有“简而廉”一条。《周礼·天官冢宰》在叙述“小宰”这一官职时指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汉代经学家郑玄把这段话的要义归结为，“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也就是说，考察官员的各项标准，都以清正廉洁为本。清廉，历来是对各级官吏的道德要求。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各级官吏在从政过程中清廉自守，不贪污、不腐败，以减轻民众的负担与公共财富的损耗，从而提高行政效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古代中国，秦汉以降，多次改朝换代，而政制几乎不变。相同政制之下，何以出现治乱兴衰

不同的局面。个中原因颇为复杂，有一点可以肯定，出现太平盛世或治世，与政治清明、道德风尚密不可分；而乱世或衰微的出现，往往与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紧密相伴。同样，一个地方，若有德才兼备的官吏治理，这个地方也就政通人和、繁荣昌盛。

客观地说，中国古代崇尚道德，其实是在追求贤人政治。然而，贤人政治并非常态，往往不能久存。有道是，知易行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古代官吏，大多学而优则仕，恐怕无人不知“为政以德”，无人不晓做官要讲官德。然而，在为官生涯中真正践行道德者却凤毛麟角。所以自古以来，法律与道德即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两种重要手段。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和道德都是具有一定约束性的规范体系。法治重在他律，具有强制性、威慑性，可稳定人们的预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重在自律，具有调节性、劝导性，可滋润社会成员的心灵。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的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的践行离不开法律约束。



牵引不断提供更多丰富精神食粮。实施齐鲁文艺高峰计划，加强历史题材、红色题材、新时代现实题材三大主题创作，推出更多激励团结奋斗的精品力作。实施乡村文化振兴，广泛开展群众性小剧小戏小品创作展演，创新推出更多公共文化服务。实施“山东手造”工程，推进文化创意设计赋能山东手造行动计划，面向全国全球开展市场营销，既振兴传统工艺，又创造新的消费、助力群众增收。实施“山东智造”工程，培育壮大网络视听等行业蓝海，推出更多数字文化产品。以“五友”外宣创新国际传播力。立足当前实际，以国际友城为抓手，开展友城、友校、友企、友媒、友人国际传播，促进正能量实现大流量，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出去”。

（作者系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德滋润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践行，倡树“自律助人、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俭绿色、共建共享”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打通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心理各场域，实施全环境立德树人，融通美德建设与信用建设，建设美德信用山东。为老年人、孩子等特殊群体提供“五为”志愿服务，在全域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以文化体验全面提升旅游高质量发展。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引领，统筹建设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四大文化体验廊道和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四廊一线”，串珠成线，集中连片式推出可观看、可参与、可带走的文化体验，办好黄河大集和海洋大集，丰富民俗文化展示，打造系列主题精品旅游路线，把“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牌擦得更亮。以重点工程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是不要民主集中制，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统一行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行动上向党中央看齐，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

肃性，把个人意志统一到党和人民的意志上来，同时形成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局面。我们党历来特别强调“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要求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是不要民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与加强民主本身就是相互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党历来重视把握加强集中统一与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辩证统一关系。如果“不善于通过民主的方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那就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强调维护党中央权



《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后期齐国贤臣晏婴言行事迹的专著。晏婴仕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长达五十余年，促使齐国在诸侯纷争的年代仍然长期处于相对兴盛的地位。《晏子春秋》所著内容集中彰显了晏婴尽礼行忠、以民为本、为政以德、躬行节俭的家国情怀。

尽忠职守 尽忠国家

“礼”是古代社会“五常”伦理价值规范之一，是社会共同遵守的秩序法则，是维系社会政治秩序的制度规范。晏婴认为，人之所以高贵，就是因为有礼，因为守礼实现了家庭、社会中的长幼有序、父子有别、上下分明。晏婴特别推崇周礼，强调要以礼治国，用礼来规范伦理秩序。他认为，在礼的规范中，大夫的施恩不应普及全国，民众不懈怠，财货不转移，工商不改行，士人不虚浮，官吏不僭越，大夫不收取公室之利。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景公想与晏婴免除礼节来欢畅共饮，但晏婴认为，“礼”对朝廷秩序有着约束作用，如果大夫不讲“礼”，下面的官员就会效仿而变得不恭敬，因而也就无法做到尽忠职守、尽忠国家。

由此可见，作为一名臣子，晏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尽礼行忠”的忠臣。对此，晏婴曾曰：“故忠臣也者，能纳善于君，不能与君陷于难。”即忠臣就是能给君主进献良言善策，不能和君王一起陷于危难。《晏子春秋》所论述的“忠”，不局限于忠于君主，更多地表达了忠于国家、社稷的思想意涵。那么，忠臣之行应该是怎样的呢？对此，晏婴认为，忠臣应该直言进谏，选拔贤人而用之，衡量自己的德行从而担任适当的官职，并获取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俸禄，看到贤于自己的人要学会让贤，不以官位高低作为自己待人的准则，也不以官位高低作为尽忠的标准，对待下属不苛刻，对待上级不阿谀奉承。

以民为本 爱民乐民

民，事之本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的立论基础，其核心要义是重视百姓疾苦，并做到爱民之所爱、乐民之所乐。为政者只有恪守以民为本的理念，注重维护百姓利益，处理好官与民、权与民的关系，才不会失去人格道义，才能维护国家稳定。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提出了利民为本的治国思想。《晏子春秋》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大量论述，包含了晏婴对官民、权民关系的深切思考。

晏婴生活的时代正值春秋晚期，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发展和宗法关系的减弱，以及外部压力的减轻，致使对各国君主和官吏权力的约束监督相对减弱，进而造成各国君主和贵族苛责于民、劳役百姓。对此，晋国大夫叔向曾向晏婴请教为政者的治国思想和行为问题。晏婴回答说，最高尚的思想是爱护百姓，最深厚的行为是使百姓快乐，最卑下的思想是苛刻待民；地位卑下而不失去尊贵的德行，委曲求全而不失去正直的品格，“以民为本也”。

作为齐国重臣，晏婴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以民为本、爱民乐民的经营理念，而且在实践中处处彰显着惠民、利民、养民的政治操行。据《晏子春秋》记载，有一次，齐景公为了扩大晏婴的住宅条件，借晏婴出使鲁国之际，把晏婴邻居的住宅拆了。晏婴得知后说，为了扩大自己的住宅而侵犯邻居的利益，违背民心。晏婴坚决不居住，并恢复邻居原来的住宅，奉守不损害百姓利益的准则。

以民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百姓的物质需求——粮食，这在农耕时代尤其如此。而要满足百姓的粮食需要，关键在于保障不误农时。据《晏子春秋》记载，在农收时节，齐景公为追求逸乐，役使大批民工兴建长康台。有一次恰逢齐景公举办大型饮宴，晏婴虽在旁边陪侍，但心里始终牵挂着无法回家收获的民工。当酒过三巡时，晏婴离开席位，边舞边唱道：庄稼结穗而不能收获，秋风吹来全部凋落，风风雨雨打全部飘散，上天无情，不让民生。晏婴唱完，潸然泪下。酒酣耳熟的齐景公明白了晏婴的深意，于是下令停止工程，民工得以回家收粮。

廉洁清正 为政以德

廉者，政之本也。官德是为政者最基本的品格要求和道德规范，体现了为官者道德修养的主体自觉和慎独的自律

《晏子春秋》与中国古代伦理秩序

□ 刘晓川

极致，与治世安邦息息相关。《晏子春秋》所蕴含的廉洁清正、为政以德的政治智慧以以德治吏、良吏治国为主线。那么，到底什么是官德呢？齐景公与晏婴关于社稷之臣、善为国家等问答，折射出晏婴对这一问题的独到思考。齐景公问晏子，对于国君而言需要什么样的臣子？晏婴答曰：所谓国家大臣，就是能够稳固国家，分清君臣上下之礼。齐景公又问，如何发现治国的贤人名士呢？晏婴答曰：评判贤人名士，要通过观察他的行为作出评价，而不是根据华丽的言辞作出判断。

晏婴在为官期间，始终以廉洁清正为本，心怀清正廉洁之心，坚守道德情操，不随波逐流，是讲官德、重官德、守官德的楷模。齐国相国庆封由于专权遭到众大夫的攻击而逃亡，人们瓜分他的财产并提议把郕厓分给晏婴作食邑。晏婴坚决不接受，认为人人都想生活充裕，但对财富既不能废弃减损，也不能任意无度。在他告老还乡时，主动提出要封邑还给齐景公，齐景公认为这没有先例，不同意晏子的提议。晏婴说，品德厚重而接受俸禄，是为了体现主上的圣明；品德微薄而退还俸禄，是为了使臣下廉洁。在晏婴看来，自己年老德薄主动把封邑退还给齐景公，这是他廉洁清正的表现。

俭以养德 躬行节俭

齐国建国之初，特别是到齐桓公时期，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改革举措，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然而，伴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积累，齐国的奢靡腐化之风也开始盛行，到齐景公时期尤为如此。《晏子春秋》不仅多处论述了齐景公嗜酒崇乐、华衣美食、大兴土木的奢靡生活，而且贯穿着晏婴对俭以养德的清醒认识。

晏婴认为，只有君主约束自己、节俭为政，才能减轻百姓负担，赢得民心。面对齐景公奢为宫室、广为台榭、丰乐侈游与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形成的鲜明对比，晏婴极力劝谏齐景公厉行节俭。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问晏婴，我想穿上圣贤之王的服饰，居住圣贤之王的房子，这样各国诸侯会来归附吗？晏婴答道：效法他们的节俭是可以的，如果只是效法他们的服饰房子，就没什么好处。齐景公又问晏婴，作为君王，身份尊贵百姓安定，这样困难呢，还是容易？晏婴回答说，作为君王，节制自己日常的开支，其余的用以照顾百姓，这样就自身尊贵而且百姓安定。

晏婴在劝谏齐景公的同时，更是身体力行、躬行一生。据《晏子春秋》记载，作为相国，晏婴吃的是粗粮淡饭，菜肴也比较简单平常，连齐景公都感到过意不去。晏婴却不以为意，觉得不仅能吃饱肚子，还能有荤菜、素菜的搭配，已经很满足了。他一再婉拒齐景公赐予的封邑、千金、狐裘、宅第、市租、乘马等，成为百官表率。

（上接1版头条）

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伟大斗争实践启发中国共产党解决好独有难题的根本方法，关系全体中国人民在巨大挑战面前能否保持战略清醒。靠什么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呢？对这个问题必须始终保持战略清醒。统一思想，从根本上说首先要统一在党确定的指导思想下，用科学理论特别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来武装全党。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就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统一意志，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强化党纪国法的严